



海伦·斯诺《阿里郎之歌——中国革命种的一个朝鲜共产党人》。

便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，因此它与朝鲜三一运动之间的相似，也就少人注意了。”还应该补充一点，前有新文化运动的牵引，后有中共建党的升华，中间还有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”，作为群众运动的五四，不再是外交事件的直接反应，更像是兼及启蒙、救亡与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。在这一意义不断叠加的过程中，五四运动最初的触媒也就逐渐

隐没在历史深处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作为北京大学教授，您如何看待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？

陈平原：毫无疑问，五四运动是干出来的，可同时也是说出来的。作为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的主体，北大学生日后不断的追忆与阐释，是五四运动获得巨大声誉且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。最早为五四运动或五四精神“命名”的，一是北大教授兼教务长顾兆熊（孟余）发表在1919年5月9日《晨报》上的《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活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》，二是北大英文系学生罗家伦在1919年5月26日《每周

作为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的主体，北大学生日后不断的追忆与阐释，是五四运动获得巨大声誉且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。

评论》上发表的《五四运动的精神》，再就是张东荪在同年5月27日《时事新报》上刊出的《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》。还有北大国文门1917级学生杨亮功和他的表兄蔡晓舟合编的《五四》，那是第一本五四运动史料集，出版于1919年9月。也就是说，北大师很早就有意识地建构有关五四的神话。而从1920年起，连续六年《晨报》及其副刊的“五四纪念”，主角都是北大学生及教授。而后，不管外界压力多大，坚持不懈地记忆、叙述与阐释五四，成了北大师生的职责与传统。这个话题，可参见我的《未完的五四》中谈论“北大学生之‘五四记忆’”那一章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普通人对五四的印象大多停留在教科书和文学史的经典叙述中，而那些五四时期出版的报章杂志，普通人又比较难看到，那么您认为普通人要了解更为真实的五四该怎么做？

陈平原：非专业读者若想了解更为真实的五四，阅读若干基本文献，我以为是必须的。教科书传播面广，但在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方面，有很大的限制，作者不能不瞻前顾后、左右平衡。有感于此，二十多年前，我选编《〈新青年〉文选》，附有长篇导言，2003年贵州教育出版社初版，201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修订版，至今已印行十二刷。除了选文精到，论述简要，篇幅不太大，适合一般人阅读，更重要的是适逢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热播，故销售状态很好。我甚至以为，若实在太忙，没时间阅读基本文献，那不妨精读以下三文，就能大致理解思想、文化及精神层面的五四：发表在1919年1月15日《新青年》第6卷第1号的陈独秀《本志罪案之答辩书》，1919年3月21日《北京大学日刊》刊出的蔡元培《致〈公言报〉函并答林琴南函》，以及刊于1919年12月1日《新青年》第7卷第1号的胡适《新思潮的意义》。至于学有余力，关注具体史实的考辨，或者学理方面的阐发，那当然是多多益善。☑

